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5.021

## ■ 文学研究

#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sup>①</sup>

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关键词:**冯至;人称话语;蜕变;话语逻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5-0127-06

## On Changes of Grammatical Person Discourse in Feng Zhi's Poems

CHEN Mei-xi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his peers, Feng Zhi has a great sense of grammatical person.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the essentially grammatical person discourse has been changed from “I” to “we”, and then to another “we” with a collective meaning. In Feng Zhi's early poems, “I” was in pursuit of individual liberation and freedom, featured by individual “I” as the essence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pirit. There was existentialism character or speech subject of existentialism in “we” in his work of the 1940s, while “we” bore the meaning of class and people in his work of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All those changes of grammatical person discourse have come out of the encounter and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oet and his times, reflecting his poetry's specialty.

**Key words:** Feng Zhi; “I”, “we”; change; discourse logic

冯至在他最后一份诗体《自传》中曾如是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诗歌……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诚如诗人所言:他的一生都是在“否定”里生活。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历程更是呈现出这一特点,而诗歌的核心人称话语则见证了这一变化的历程。本文将从诗歌核心人称话语的嬗变历程入手,分三个阶段解读冯至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诗歌创作。

① 收稿日期:2013-11-2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1C1146);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汉语言文字学项目资助成果

作者简介:陈美霞(1977-),女,湖南常德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一 早期诗歌:人称话语“我”的统摄

“五四”是一个以人的解放、个性自由为基本诉求的时期,文学特质鲜明,正如钱理群等所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sup>[1]27</sup>青年冯至也不例外,在其早期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以第一人称单数“我”充当抒情主人公的诗歌。据统计,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130余首诗作中,大约78%的诗篇运用了抒情主人公“我”。可以说,话语人称“我”基本统摄、主导了冯至早期的诗歌。诗人主要借助“我”这一具有鲜明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人称来抒写现实的无情、青春的苦闷、爱情的痛苦和人生的愁怨。正如冯至自己所说:“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sup>[2]153</sup>因此,冯至早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个性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展现自我,表达自我,是“五四”精血的一脉,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这类以人称话语“我”为主导的诗歌中,诗人主要通过“我”记录了他二三十年代的情感历程。“他倾听着自己心灵的声音,唱出了他的理想、向往、苦闷与彷徨之情。”<sup>[3]68</sup>对于生活,年青的诗人曾给以浪漫的遐想与美好的憧憬:“灿烂的银花/在晴朗的天空飘散;/金黄的阳光/把屋顶树枝染遍”,“我”期盼着被“驯美的白鸽”引领前去。但是这种虚幻的想象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般,一遭遇到残酷的现实,就立即被击得粉碎。面对现实之丑恶,未来之渺茫,理想之幻灭,诗人感到沉重的压抑和苦闷。苦闷就像“雄浑无边的大海”(《海滨》),尽管“我”曾无数次地对着这荒凉无爱的人间竭力呼喊:“爱!爱!爱!”(《“晚报”》),无奈“人间是怎样的无情,/我感受的尽是苦恼”(《你——》)。“我”似乎只有去那苍白月光照着孤寂花儿哭泣的凄凉地方,“狂吻那柔弱的花瓣”(《夜深了》),长息在花儿身边,才能得到解脱。“我”心中的孤独、苦闷和忧伤之情被强调至无以复加的程度。

1927年秋,诗人从北大毕业,走出象牙塔,此后,“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sup>[4]151</sup>的艰难的路,开始独自走进现实生活的途程。哈尔滨短短不到一年的生活经历,给冯至上了一堂严肃而深刻的社会教育课。在那里,他看到了现实的丑陋与无情:“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还有中国的市侩,/面上总是淫淫地嘻笑。”(《北游·4》)生活在这地狱一般的北国之城,诗人再也不堪忍受,以其激越而怒不可遏的义正词严控诉起它的罪恶:“这里有人在计算他的妻子,/这里有人在欺骗他的爱人……”而作为理智和清醒尚存的“我”来说,“我既不为善,更不做恶”,“我”只希望这座可怕而可恶的城快快毁灭,“最该毁灭的,是这里的这些游魂!”(《北游·11》)如此的严词厉句在冯至此前的诗作中是难以找寻的,诗中的“我”已由《昨日之歌》中的幽婉沉郁而变为慷慨愤激。应该说,这种转变来自现实的赐予,是残酷无情的现实深深锥痛了诗人的灵魂,促使他跳出对青春与爱情的浅吟低唱,从而转向审视自我,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到底要往哪里走去”(《北游·8》)。经过反复的拷问与思量,诗人认识到:“我既不是中古的勇士,也不是现代的英雄,我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感情。”<sup>[4]124</sup>于是诗人“埋葬了”自己的“一切梦幻”,回归真实的自我。

## 二 20世纪40年代“我们”的“思之诗”

自《北游》跳出吟唱爱情与青春的狭小圈子,转向批判现实,抒写个人生存状态开始,冯至踏上了探寻生命存在本质及其意义的道路。这为他在30年代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之后,诗人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即追求雕塑似的诗。自此,诗人逐渐背离了浪漫的直抒胸臆式道路,转而走向智性冥想的诗之旅。1930年所写的《等待》等诗便可视作这一转换的开始。同年9月,诗人赴德留学,在那里,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里尔克、歌德等大师级人物思想的熏陶,并在留学期间写下了《无眠的夜半》等具有现代主义品格的作品,体现了诗人

较为典型的存在主义思想。表明诗人已经形成对人生、社会、艺术的一系列的固定、明确思想和观念。

1935年9月,怀着对存在主义的信仰和对里尔克的膜拜,新婚诗人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归国之途。然而,回国后国欲破、山河在的悲惨社会现实令人心碎。此时,不仅国共两党的斗争愈益激烈,而且,日寇的魔爪已伸至华北,紧张的国内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辗转难眠。在此情形之下,大多数诗人走出象牙塔,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写出带有明显现实倾向性的作品。而冯至却做出了与此不同的选择——转向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反思与追问,希图在艺术创作中把捉生命的价值。组诗《给一个死去的朋友》便是这一选择的结果,其中不仅融合了里尔克的思想理念和艺术精神,表现了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显示了诗人日趋娴熟的现代主义诗艺,更重要的是,诗中出现了复数人称“我们”,且这个“我们”显然有异于20年代的那个“我”,“我们”表现了一种生与死的联系,是一个宏观的、集体性的人称主体,表现的是一般哲理。不仅如此,这个“我们”也不同于诗人留德之时思想发生转变之后所作的诗篇中的人称“我们”(如《雪后》),因为当时其思想上的转变虽已完成,但还没有回到祖国,更没有亲眼目睹灾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也没有亲身经历恶劣污浊的现实环境,他的这种转变相对后来所写的《十四行集》来说,缺乏相应对等的外部环境条件,还没有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转化。因此,《给一个死去的朋友》标志着冯至诗歌人称话语的转折。从此,冯至的诗歌中开始频现“我们”这一主体人称,频率之高,在《十四行集》中达60%左右。那么,这个“我们”究竟意指为何?为什么会发生核心人称话语的转变?在这一巨大变化的背后,又意味着诗人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是谁?具有怎样的本质特征?首先,“我们”是真实独立的生存者、承担者<sup>[5]162-163</sup>。正如诗人所说:“谁若是要真实的生活,就必须……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不能容有一些儿代替。”<sup>[6]283</sup>这是“我们”的实质,也是“我们”面临的本来处境。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我们准备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在人生的途中,有许多艰难、坎坷,如同“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应当主动领受、自觉承担,不能回避,也不能逃离。其次,“我们”是向死而生的涅槃者。面对死亡向死而生是“我们”的死亡观,也是“我们”达到本真存在的途径之一:“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在这里,“我们”“为死而在”,“先行就死”,把死亡视为生命中最辉煌、最神圣的时刻,向着死亡筹划和安排人生,积极坦然地面对死亡<sup>[5]155-157</sup>。就像施太格·缪勒评价里尔克时所说:“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的东西而出现的。”<sup>[7]184</sup>有生命就必然有死亡,死是生的一部分,死亡是生命的圆满完成,只有真正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平静地面对死和更主动地投入人生。再次,“我们”是交往于天地万物的联系者。“我们”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就像“西方的那座水城”,“它是个人世的象征……当你向我拉一拉手,/便像一座水上的桥……”(《威尼斯》)。“我们”包括世上所有的人和物都是互相关联,彼此贯通的,“我们”不能脱离其他的存在而单独探求自我的生存,只有在相互交流的环境与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本真自我。当“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时,“我们”、他人和自然之间互相交融、密合为一体。“我们”通过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将之化为自己的生命,扩充自我的存在。第四,“我们”是虚心谦敬的发现者。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只有“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静听他们的有声和无语,分担他们人们都漠然视之的命运”<sup>[8]34</sup>,才能把握住一些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的本质。而且,“我们”为了把捉住那些被人忽略、被人遗忘的但却是本质性存在的东西,往往把目光投向熟悉的、日常的事物。

从20年代跨越到40年代,无论是从人称代词的表面形式看,还是从主体人称的实质内涵审视,冯至诗歌核心人称话语转变既成显著的事实。那么,在这一巨大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契机和因由呢?

第一,存在主义思想与感时忧国精神的驱使。雅斯贝斯实存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人的可能实存的呼吁”<sup>[7]233</sup>,对于这一目的,冯至积极致力于它的实现,早在30年代初期翻译里尔克的作品时,他

就明确指出:“青年们现在正陷于错误和混乱之中,我的责任是翻译一些里尔克的作品,好让他们通过里尔克的提示和道路得到启发,拯救自己,以避免错误和混乱。”<sup>[9]146-147</sup>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眼光和气度。而在《十四行集》中,这种眼光和气度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诗集通过对“我们”每一个生存者存在的勇气和自觉的呼唤,通过对“我们”每一个大写的“人”的呼唤,以期达到民族复兴与自强。所以陆耀东曾做如是评价:“《十四行集》表明,冯至的思想,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更加关注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宇宙的发展。”<sup>[10]160</sup>就在诗人对人类命运予以整体观照并力图呼唤真实的生存的同时,感时忧国的精神也如影之随形,相伴左右。具体而言,《原野的哭声》通过描绘农妇村童遭受战争祸害的悲惨画面,从而扩大到对整个受难民众的抒写,明显体现了诗人感时忧民的热肠。《鲁迅》、《杜甫》、《蔡元培》和《画家梵河》等诗则分别描绘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关注现实、忧时忧民,并亲身实践致力于时代现实的改造与推进,从而折射出诗人内在的感时忧国精神。

在存在主义整体性观照的过程中,更兼感时忧国精神的驱使,使得诗人在关注个体生命及其存在的同时,兼顾国计民生,旁及民族大计。所以才有《十四行集》里对“原野的哭声”的关注,对鲁迅等伟大形象的雕刻,也才有对“我们”每一个生存者存在的勇气和自觉的呼唤,对“我们”每一个大写的“人”的呼唤。由此可知,《十四行集》中的听者已然是一个群体性存在,鉴于此,其核心人称话语转变为复数人称“我们”成为理所当然。

第二,雅斯贝斯“爱”的交往、里尔克的敞开理论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关于“爱”的交往,雅斯贝斯认为:“人只有在与其他实存的精神交往中才能达到他本然的自我。”<sup>[7]235</sup>这就是雅氏“交往”理论的核心思想。简单地说,就是不发生交往,“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当然,这里的交往不是指一般的交往,而是本真的、契入生存境域的并向无限的超越敞开的交往。通过这种“爱”的交往,使得双方即真正的存在者之间彼此分享,相互承担,并“在对对方苦乐的承担中使自身存在获得重量和意义”<sup>[11]</sup>,使自我获得完善,得到充实。作为雅斯贝斯的学生,冯至深受其影响,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sup>[8]55</sup>冯至的这一说法正是对雅氏“通过别的实存并与别的实存一起”达到本然自我的实存哲学的继承与通俗化阐释。里尔克的“敞开”理论对冯至来说,影响更直接、更深远。里尔克认为:“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sup>[8]86</sup>这段话可以目为里尔克关于他的“敞开”理论的经典自我阐释。对此,冯至甚为赞赏,铭记于心并亲身践行,如在《十四行集》中,他遍察与他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人、事、物的真实,体味其悲欢,达到了灵魂相遇往返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深深植根于冯至的思想中。这一观念恰好暗合于雅斯贝斯“爱”的交往和里尔克的“敞开”理论<sup>[12]247</sup>。体现在冯诗中,平凡的小草、静默的树木、初生的小狗、飘扬的风旗等等,无不是与人的生命世界相贯通、相交融的万物。正因为如此,冯至的弟子郑敏曾说,《十四行集》体现了“万物无不相通共存,万物又存于一,一来自‘无’”<sup>[13]</sup>的哲学观。

实际上,不论是雅氏“爱”的交往也好,里尔克的生命个体向外界敞开也好,还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好,都是个体生命与外界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性行为,在主体范围和思想上具有“我们”性,从而导致其诗歌核心人称话语变换成“我们”。然而,由于冯至的思想里潜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致使他在接受存在主义时形成一种误读。西方的存在主义,不管是雅斯贝斯的还是里尔克的,都是一种纯粹“形而上”的哲理性思考,而冯至却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人生状况结合起来,使得原本十分抽象玄奥的存在主义变成了中国化、通俗化,与现实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存在主义。因此,冯至诗中的人称话语“我们”与西方存在主义的“我们”的内涵又是有差别的。这也为他在50年代完全滑入现实预留了一条通道。

第三,时代语境的作用。当时,以救亡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拥有对诸多事件的阐释权力,当然也包括对诗歌的阐释权力。体现在对诗歌创作的要求上:诗歌必须具有鼓动性、民众性。基于这一要求,很快便出现了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主体人称的繁荣现象。朱自清在谈论当时盛行的“朗诵诗”时就曾如是说:“朗诵诗中‘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代替了‘我’。”<sup>[14]502-504</sup>其他一些诗体如街头诗、枪杆诗、传单诗等,情形也大致相同,都不再是从前那种个人情感的抒写,而是要为大众代言,并影响大众与社会现实,“我们”成为一个核心语汇,扮演着主流话语的意识主体角色。在《十四行集》中,“我们”同样扮演着这一角色。在强大的时代主流话语面前,冯至虽然站在一个疏离于主流话语的边缘性立场,但他并未因此真正逃离时代主流话语的引力范围而获得完全自由的边缘性他者地位<sup>[15]</sup>。集体性主流话语凭借复数人称“我们”潜入文本诗行中,诗人并未获得纯粹的个人性。

### 三 “十七年”颂歌——“我们”为政治代言

虽然在1940~1941年间,冯至找到了一条完全适合自己的艺术道路,并在这条路上树立起一座丰碑——《十四行集》,但是,外界的战火纷飞、炮声隆隆和强大的为抗战而写作的热潮,使其创作难以为继。特别是在听了老舍所做的为抗战而作文的演讲之后,冯至深感自责和愧疚,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做出一些自我调整和新的选择。而此时冯至一家又从林场茅屋搬回城内居住,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并且,此时冯至接触到歌德的“蜕变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永久活动和变化的,蜕变是一切生命的必然过程,但也是生命的自我选择,每一次蜕变,都可使生命获得新生。这种认识使得冯至找到了抛弃思考宇宙和人生,转向关注现实的重要依据。于是,在1942年以后,冯至开始转向现实。如《伍子胥》中诗人高度重视决断的观念,表明诗人的思想在与过去决断,诗作《歧路》和《我们的时代》也透露了诗人朝向现实转变的信息,而此时杂文则更是成为冯至揭露丑恶现实、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主要武器。

尽管如此,诗人一开始并没有完全丢失自我,失却个性,而是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坚持自我、卫护个性。如杂文《工作而等待》、《论个人的地位》等都集中表达了诗人对自我和个性的肯定与捍卫。诗人在转向现实的途中充满着矛盾、犹疑甚至痛苦,经历了蜕变之痛。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痛苦的自我调整阶段,冯至后来的“突然”转向才能让人理解。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冯至诗歌创作发生了第二次转轨,《第一首歌》是其标志。这首诗是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所作,它激情地赞颂了“五四”所带来的开创性意义,完全失却了十四行诗内省式的哲理化抒情意味,而变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情感抒发,虽然它“仍明显地保留了不过于直露的长处”<sup>[16]240</sup>,但风格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抒情主体而言,“我们”这一复数人称再次进入诗歌成为核心的人称话语。此后冯至进入到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直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诗歌核心人称话语仍然是复数性人称“我们”,据统计,这一人称的出现率高达60%以上。那么,这个“我们”是指什么?它与40年代的“我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又昭示了什么?

相比较40年代的抒情主体而言,新时代诗歌中的核心人称话语“我们”的内涵以及整个诗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作品的主要内容看,50年代的诗作不再是对宇宙、人生的沉思,而是转向对党、对新社会、对社会主义祖国发生巨变的讴歌。对此,诗人自己也曾明确指出:“诗里基本的调子和过去的也迥然不同,有信心,有前途,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同时对于人民的敌人也给予讽刺和攻击。”<sup>[2]133</sup>从情感和抒情人称来看,诗人抒发的既是当时个人的真情实感,更是那个时代的“大我”的感情,这种情感通过抒情主体“我们”传达出来,“我们”成为阶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身。在“我们”那里,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泯灭或遮蔽,表现出鲜明的共性模式,往往仅止于粗线条的时代写意或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或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流于肤浅和一般化的情感抒发。比如:“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生产更多的钢铁,/我们要发出更多的电力……我们给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垂头丧气。”诗中的“我们”单调、直白,流于空泛的符号化,不具备诗的品格。如果拿这首诗与《十四行集》里的任意一首作比较,其好坏优劣,不言自喻。

由此可见,50年代的话语人称“我们”与40年代的“我们”已经全然不同,50年代的“我们”作为阶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身,再也不似40年代的“我们”那样个性突出,棱角分明,而是戴上了大众化的脸谱,唱着现实的、浮浅的、粗糙的、整齐划一的颂歌,抒发着廉价的乐观主义,化身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我们”。

抒情主体“我们”的个性缺失了,50年代冯诗的诗性也随之被削弱,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客观形势的促成,从1950年到1966年前后,政治运动此消彼长、接连不断,如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等,每次批判运动几乎都与文学界有关,文学真正成为时代政治的晴雨表,作家和作品轻则受到“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重则与国际政治运动中的“帝反修”挂在一起。在那个政治左右文学的时代里,不允许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除非这个声音就是当下时代的声音。在这样的语境中,诗性的流失是必然的。二是出于诗人本身的原因。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冯至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委以重任而产生的知遇意识、感激之情的支配下,同时又为眼前热闹的景象所陶醉,“对于社会的复杂,道路的曲折,前进中的困难,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缺少基本的思考。与此同时,又把个人的幸福,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寄托在个人身上。”<sup>[17]302</sup>在这种思想意识主导下,冯诗必然迷失自我的个性。其次,在表达方式上,诗人完全抛弃了旧有的适合于他本身的诗歌艺术表达方式,采取一种直白的、简单的抒情方法,加之诗人对他所要表现的新生活还不熟悉,因此,要用一种完全不适用于自己的抒情方式来歌唱他并不太熟悉的新生活,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

## 参考文献:

-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三十年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韩耀成.冯至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 蒋勤国.冯至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 韩耀成.冯至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5] 解志熙.生的执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6] 韩耀成.冯至全集(第十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7]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8] 韩耀成.冯至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9] 韩耀成.冯至全集(第十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0] 陆耀东.中国现代四作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 [11] 解志熙.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J].外国文学评论,1990(4):79-88.
- [12] 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13] 郑敏.忆冯至吾师——重读《十四行集》[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4(8):86-91.
- [14]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 [15] 姜涛.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4):147-148.
- [16] 陆耀东.冯至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 [17] 周棉.冯至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龙四清)